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

方克立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

方克立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钱月华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

方克立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97,000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000

书号 2001·211 定价 1.25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古代朴素的 知行观	(1)
第二章 先秦诸子的知行学说	(10)
一 儒家学派	(11)
甲 孔丘	(11)
乙 孟轲	(23)
丙 荀况	(30)
二 墨家学派	(44)
甲 墨翟	(44)
乙 后期墨家	(52)
三 道家学派	(60)
甲 《老子》	(60)
乙 庄周	(67)
四 法家学派	(76)
小结	(85)
第三章 汉唐时期的知行学说	(89)
一 董仲舒	(90)
二 王充	(98)
三 佛教诸宗	(114)
甲 天台宗	(116)
乙 法相宗	(120)
丙 华严宗	(124)

丁 禅宗	(128)
小结	(132)
第四章 宋代程朱学派的知先后说	(136)
一 程颐	(139)
知吾固有	(139)
致知在格物	(142)
知先后后	(147)
行难知亦难	(153)
二 朱熹	(156)
格物致知	(157)
知先后后	(167)
行重知轻	(175)
知行相须互发	(179)
第五章 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185)
心即理	(191)
知行合一	(199)
致良知	(208)
第六章 清初王夫之、颜元等人的行先知后说	(218)
一 反道学的先行者	(219)
甲 陈亮、叶适	(219)
乙 王廷相	(228)
二 王夫之	(236)
能与所	(238)
致知之途	(243)
行先知后	(250)
行可兼知	(256)
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	(265)
三 颜元	(275)
小结	(297)

第七章	近代魏源、谭嗣同、章太炎的知行学说·····	(302)
一	魏源·····	(303)
二	谭嗣同·····	(312)
三	章太炎·····	(322)
第八章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336)
	行易知难十证·····	(341)
	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	(347)
	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	(357)
	知行分任·····	(365)
结束语	《实践论》——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的 科学总结·····	(377)

第一章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古代朴素的知行观

一九一八年，孙中山先生作《心理建设》，提出“知难行易”作为他的学说的哲学理论基础，力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革命斗争的需要迫使他研究认识论问题。他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曾沉痛地指出：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踏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说始于传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①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104—105页。

被孙中山如此疾视、不遗余力地攻击的“知易行难”说，到底是什么时代、什么人提出来的？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或者，作为一句道德箴言），它的本来意义为何？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它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以至对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到底有些什么影响呢？这些是我们应该搞清楚的。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出自儒家经典《尚书》的《说命中》篇，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孙中山也沿袭了这种传统观点，故称“此说始于传说对武丁之言”，毫不怀疑记载此说的历史文献的真实性，认真地相信“知易行难”是商朝的传说最先提出来的。

自从清代学者考证出《尚书》除今文二十八篇以外的古文部分皆系伪作之后，“知易行难”说产生的时代就成为问题了。原来《尚书》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别。汉文帝时济南伏生传授的二十八篇称为《今文尚书》。据说汉武帝末年在孔子住宅的壁中又发现一种《古文尚书》，比今文多了十六篇。这部书到东汉以后就失传了。东晋时，有个叫梅赜的人，自称得到了这部书，还附有一篇据说是孔安国作的“传”，这就是今存《古文尚书》。唐代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就是用的这个本子，成为当时官方颁行的《书经》的定本。南宋时朱熹的弟子蔡沈撰《书经集传》，也是兼采今古文，成为元代以后科举取士的标准经典之一。清代以前，虽然已有少数学者对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传》表示怀疑，但证据不足。作为儒家经典，它仍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惠栋作《古文尚书考》，用种种考据方法，一一揭发其作伪的来源，学术界才公认梅赜所献书为伪书。

《说命中》就是伪《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因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提出的时代，就成了问题。

从哲学思想和一般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在殷高宗武丁和傅说生活的时代，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样普遍的哲学命题或道德箴言，绝无可能。我们知道，我国文字的发展到商朝后期已经基本成熟，甲骨卜辞和器物铭文中出现的字，数目已达四千五百个左右。甲骨文中“行”字作，象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它的本义是道路。《说文》：“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于。”步趋，走路或走已经是行的引申义，进一步又引申为行动、实际地做或实践的意思。字义的引申意味着语言的变迁和丰富化，它同思维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甲骨文中，“行”字绝没有后来作为哲学范畴的“实践”或作为道德概念的“德行”的意思。甲骨卜辞中常见的“行”字，是祖甲时代一个贞人（占卜者）的名字。如《殷虚粹编》第二七九片：“丁丑卜行贞：王室父丁殪亡尤。”第三一〇片：“〔庚辰〕卜行贞：王室兄庚亡尤。”“父丁”是指商王武丁（高宗），他是祖甲的父亲；“兄庚”是指祖庚，他是祖甲的哥哥。“行”和“尹”、“旅”、“即”等一样，都是祖甲时代卜人的名字。在甲骨文中，“行”字都是作名词用，没有作动词用的。《诗经·周南·卷耳》：“嗟我怀人，真彼周行。”用的还是行字的本义。

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知”字，只有“智”字。古文智字写作。《说文》：“智，识词也，从白从亏从知。”意义不甚明确。《殷虚书契前编》卷五第十七页有一智字，写作，省白。当作知道、懂得、认识之意讲的“知”字，是后来才有的。

由此可见，在商朝以至西周时期，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代甚至连个“知”字都没有，“行”字也没有后来引申发展出来的做或实践的含意。把“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托为傅说对武丁之言，乃是后人的造作，决不是历史的事实。

在商和西周时期，宗教天命观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完

全抹煞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动性,因此一般说来,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可能提出知和行的关系这样的哲学问题。要抽象出作为认识论范畴的“知”和“行”的概念,并对知行关系提出一种见解,没有一定的抽象思维水平,显然是不可能的。思想如果不能从感性直观中超拔出来,人们就始终不能进入哲学的领域。商和西周还是哲学思想萌芽的时期,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还有着不解之缘,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还没有产生。如果把一些当时还不可能产生的哲学思想硬要挂在那个时代的人的名下,那就是犯了黑格尔曾经批评过的“改铸古人”的错误;正是这一批评,列宁称赞黑格尔是“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①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既然不可能产生于商朝,不可能是“始于传说对武丁之言”,那么,我们能不能根据《古文尚书》是伪书,就全部否定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影响呢?如果不能,这种知行学说到底是什么时代提出来的?它是什么样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呢?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提出,最迟不会晚于东晋,至少它在此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思想界是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清代学者揭发梅賾所献的《古文尚书》系伪书,一一指出其作伪的来源,这说明《古文尚书》中记载的一些历史人物、事件以至某些语言,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先秦许多著作中都引用过《尚书》中的话,如《礼记》中的《学记》、《缙衣》、《文王世子》诸篇,都曾引据“《兑命》曰”,《兑命》就是《说命》,可知《尚书》原有《说命》篇,伪《古文尚书·说命(上、中、下)》中的一些话也是有所自来的。所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虽然不可能在商西周时期提出,但不一定晚出至东晋时代,这种思想有可能在秦汉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以前就存在的。伪《古文尚书》的作者可能是抄袭古代典籍中的话，也可能是根据古代思想加工制作出来的。我们认为，这种思想有可能产生于奴隶制日趋瓦解和封建制逐渐生长的春秋时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很可能已经是当时人们中普遍流行的一句成语，这从《左传》的记载中也有同类思想可以得到证明。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是说人们认识一件事情，懂得一个道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把它付诸实行，把主观认识变为客观实践的活动。伪《古文尚书·说命中》篇记载了一段殷高宗武丁和他的大臣傅说的对话，它的大意是说：傅说受命总理百官，于是竭尽忠诚，向武丁进言了一套治国的方案，其要点是要统治者奉行天道，因时立教，平时说话、动兵、赏罚要谨慎，办事情要深思熟虑、有备无患，不要伐善矜能、文过饰非，要任贤使能，不要引进私亲和宠倖之人，敬天祭祖不可失之过黷，也不可失之过烦等等。武丁听了这一番话后，很受感动，表示要照着他讲的去做。这时，傅说叩头再拜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紧接着又说：“王忱不艰。”只要君王您有真诚的态度，下决心去做，做到也是不困难的。

这段君臣对话，说的是如何巩固国家政权的问题，其中也涉及到知行问题。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原则属知，贯彻实行这些方针、政策、原则属行。知和行之间本来没有一个绝对的谁难谁易的问题。武丁听了傅说进言的治国方案，表示知道了并准备实行。对于他来说，这种“知”是闻知，而不是亲知，是间接经验，而不是直接经验。从一定意义说，这种“知”得来是比较容易的，而要把它付诸实行就困难得多。如果他认识得并不真切，如果他没有实行的决心，那么“知”就永远停留在主观认识阶段，或口头上，而不能变成实际行动，再好的方案也不能变成现实。这时傅说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强调“行”的困难，强调“行”的重要性，无疑是有实际意义的。

按照伪《古文尚书·说命中》篇的说法，“知易行难”也不是绝对的。“行之惟艰”可以转化为“不艰”，转化的条件是“王忱”，就是君王付诸实行的诚意和决心。这比后人把“知易行难”绝对化，比孙中山把“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绝对对立起来的做法，还是包含较多的合理因素的。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一种朴素的知行观，它一方面反映了知和行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即存在着知行脱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着重提出了知行统一的要求，即要求知道了必须实行，说到必须做到，反对知而不行，空说不做。它是以“知易行难”的形式来表述的，强调行比知难，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这种朴素的知行统一观，虽不必是商朝的传说最先提出来的，但在春秋时期一些比较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确已达到了类似这样的认识。《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五三二年），晋平公卒，各诸侯国都按照传统礼节，派了大夫一级的使臣到晋国去参加葬礼。郑国大夫子皮“将以币行”，即打算在葬礼完毕后接着举行庆新君登基之礼，带着见新君的厚礼前往晋国。子产告诫他说：“丧，焉用币？用币必百两（辆），百两必千人。千人至，将不行。不行，必尽用之。几千人而国不亡！”子皮不听劝戒，“固请以行”。结果正如子产所言，晋平公的葬礼完毕后，各国大夫欲因见新君的要求遭到了有礼貌的拒绝，子皮一行“尽用其币”而归。子皮从这件事得到了教训，他很有感慨地对子羽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则不足。《书》曰：‘欲败度，纵败礼。’我之谓矣。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

“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同“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大体是一个意思，都是讲的认识一件事情、懂得一个道理并不困难，真正把

它付诸行动就比较困难了，关键在于“行之”。只有“行之”，知或不知、真知或伪知才得到了检验。

从《左传》记载的这条材料，可知在春秋时期，最迟在春秋晚期，知易行难的思想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人们对知行关系的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要取得行为的成功，必须有知的指导。如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左传》宣公十二年）“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左传》成公元年）从这个意义可以说是知在行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杜预注：言有次），其过鲜矣。’”思之先，行之后，行无越思，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第二，知道了就要做到，反对知和行的脱节。在《左传》中，除昭公十年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说法外，昭公三年也有“君子曰：弗知实难，知而弗从，祸莫大焉”的议论。对知行关系作这样两个方面的了解，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譬如，没有回答知识的来源问题，没有揭示行为知之因），但是也包含着局部的真理，尽管它是以朴素的形式表述出来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有可能在这个时期产生，甚至可能是这个时期的人们中间普遍流传的一句成语，一句包含哲理的格言。人们说话时引据“君子曰”，就是说别人或前人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了。伪《古文尚书》的作者托为傅说对武丁之言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不会没有先行思想资料的借鉴而完全凭空杜撰出这句话来。

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

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①任何一个思想、原理的提出，都不是任意的，偶然的，由某个思想家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关系的反映。为什么“知易行难”成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命题，而“知难行易”却成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命题，我们都只能从各该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由它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解答。我们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有可能产生于春秋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已经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在奴隶主阶级的人们当中，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现象是必然地大量地普遍地存在着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调节本阶级成员之间的关系，制定了一整套等级礼仪和孝、悌、忠、信等道德原则，可是由他们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生活实践，却又处处违背和破坏这些礼仪和原则；特别是到了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僭越和乱礼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出现了“礼坏乐崩”的严重局面。“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正是对于这种原则和生活实践脱节的现象的哀叹，也是当时守旧的人们为了维护旧的上层建筑所作的一种努力，即要求人们在行动中继续遵守那些已知的礼仪和原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反映了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旧的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践效果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他们主观上总是想着怎样维护和巩固旧的统治秩序，幻想着“天命永在兹”，而他们主观上想的在客观实践中又总是做不到，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于是产生了“行难”的思想。托传说之口说出来的话，可能正是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知和行已经无法统一或很难统一的反映，于是才有人突出地提出了知行统一的要求，把知行问题作为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最迫切的理论问题。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有可能对“知之非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8页。

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作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去解决一些局部的实际问题。

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自相矛盾的。”^①言行不一，知行脱节，可以说是剥削阶级的通病。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正是一切剥削阶级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写照。所以，产生于奴隶制瓦解时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在长期封建社会中仍然被看作是牢不可破的真理，因为它反映的客观矛盾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基础依然存在。一方面，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它可以成为要求人们言行一致、知行统一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为自己的言行不一、知行脱节作辩解的理论根据。对它作积极的了解，可以鼓励人们重视实行，反对空说空知不行的坏习气；对它作消极的了解，又可以成为卑怯的人们不肯下功夫去求知，又畏难不敢行的一个借口。“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种朴素的知行观，以后确实曾被各种不同的人所利用，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孙中山对“知易行难”说的消极影响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但是他不了解这种思想产生和流行的社会物质根源，过分夸大了它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甚至得出了“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②的唯心主义结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我们对“知易行难”说产生时代的分析和判断，不仅有前述历史材料作为基础，更主要的是依据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2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5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第二章 先秦诸子的知行学说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老格言，作为一种朴素的知行观，它涉及到知行关系问题的某些方面，主要是既知之后，它要求行和知的统一，认为“行之”较“知之”为难，“行之”更重要。但是，它还远不是科学的知行观，没有涉及哲学上的知行问题的全部意义，甚至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所在。

作为认识论上长期争论焦点之一的知行问题，本质的分歧不在于“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而是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自己的头脑里固有的吗？还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也就是说，是知先于行，离行而言知；还是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这个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以及同它相联系的致知的方法问题，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问题，等等，是历来的哲学家们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并因而形成了认识论上的两军对战。

这个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第一个开创私家学派的孔丘首先提出来的。活跃于战国时期的各派哲学家们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各自的哲学路线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知行观。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①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先秦哲学的纷繁复杂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的各种哲学思想、学说的胚胎和萌芽。认识论上的先验论和朴素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

反映论的各种形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先秦哲学中找到其典型代表，它们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了解先秦诸子的知行学说，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知行学说发展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儒家学派

甲 孔 丘

我国古代第一个重要学派儒家的创始人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在后人为他记述的语录《论语》一书中，虽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哲学学说和认识理论，但是已经讨论到关于知识和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就包括了他的知行观。

孔丘生活于春秋末年，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本人出身于旧奴隶主贵族家庭，曾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和熏习，在思想感情上总是同情、留恋奴隶制的旧事物。但由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工作，接触到广泛的社会阶层，体察到时代脉搏的跳荡，因此他也不能不面对现实，接受和容纳一些新的东西。在孔丘的思想中，充满了新和旧、进步和保守、唯物和唯心的矛盾，他的知行观也表现出同样的矛盾性格。

孔丘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①

这段话是他的认识论思想最集中最完整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他的认识论的纲领。

在这里，孔丘以知识为标准，把人划分为若干等级，其中提出了三条界限：一是能知和不能知的界限，二是生知和学知的界限，

^① 《论语·季氏》，下引此书，只注篇名。